

外國勢力操控「雷動計劃」 圖奪香港管治權

卓偉

立法會選舉日凌晨，戴耀廷的「雷動計劃」曝光，「棄保」名單公諸於眾。所謂的「雷動計劃」根本就是一場黑箱作業的選舉操作，不論是幕後操盤人及經費資金都是由外國勢力提供，目的是要左右立法會選舉，爭奪香港管治權。「雷動」本質上就是「佔中」的一種延伸或者升級，只是戰場從街頭轉為議會。同時，外國勢力亦通過「雷動」清走一些過氣的反對派政客，換上更加聽話、更能服從部署的新人。

「雷動計劃」是一場人為操控的配票行動，由戴耀廷根據所謂民調，決定反對派支持者應該支持哪些候選人，放棄哪些候選人，從而爭取到最多議席。這個計劃的靈感顯然是來自台灣民進黨。然而，民進黨是由黨中央直接進行配票，加上大量地區權腳，才可以達到效果。戴耀廷只是一介書生，無權無勢、無兵司令，憑什麼想出這樣一個大型配票計劃？如果說，背後沒有人支持、沒有人提供財政支援，在「佔中」已經搞到「一身蟻」的戴耀廷，會沒事找事幹，搞出一場「雷動」嗎？

都與外國勢力有千絲萬縷關係

事實上，「雷動計劃」的核心成員，除了戴耀廷之

外，還有徐向紅、辛智芬兩人，這兩人都加拿大籍，辛曾任職溫哥華法庭傳譯師、加拿大翻譯協會會長，與美國、加拿大政府關係密切。而「雷動計劃」本身亦與加拿大在野黨「一起投票運動」(Vote Together Campaign)的模式相近，明顯是有人將計劃移花接木到香港，而戴耀廷不過是前台人物。同時，辛智芬不僅與美加政府關係密切，更與一個叫「公民資料」的團隊有合作關係。而「公民資料」成員多為「Code4HK」核心技术成員，「Code4HK」是由西方某國非政府組織在港孵化的民間資料組織，該組織曾直接參與推動「佔中」。即是說，「雷動」的骨幹也是「佔中」的骨幹，都與外國勢力有千絲萬縷關係。

與「佔中」耗資數億港元相比，「雷動計劃」的經費有所不及，但同樣所費不菲，前期大量準備工作、設立「雷動聲吶」民調系統，都需要聘請大量專業的技術人員研發操作，加上在各區舉行「對話會」、投在網絡及傳媒上的廣告宣傳，以及統計及後勤工作人員人工，這些開銷加起來，據專家估算「沒有3,000萬拿不下來」。但至今戴耀廷從未公開過開支、籌款明細，這些龐大的經費從何而來，戴耀廷一直守口如瓶。

但其實，「雷動」的經費很可能與「佔中」一樣，主要來自黎智英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2014年上半年，NED負責人路易莎·格雷夫就曾與戴耀廷見面，密謀「佔中」事宜，隨後NED就通過反對派政客以及「佔中」主辦方，迂迴地將大量資金通過他們轉到「佔中」。NED這個由美國政府贊助的所謂民間組織，動機從來令人質疑。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丹·蓋瑞特曾表示，「華盛頓要求繼續在香港推動民間、社會力量爭取民主訴求運動，尤其是推動青少年在社運扮演先鋒角色。」NED正是為華府的戰略提供配套，戴耀廷一直不肯交代經費來源，正反映「雷動」與外國勢力及外國金錢大有關係。

再看「雷動」的技術支援，是由具西方政府背景的「雲閃」公司(Cloud Flare)為「雷動聲吶」提供免費

網絡安全服務；微軟公司則免費提供專用伺服器搭載「雷動」的民調系統。這些費用都極為高昂，並且不是普通的公司都能夠聘用，「雷動」如果沒有得到外國勢力支持，怎可能得到這些大型國際企業的合作？

爭取過半數議席 續狙擊施政

外國勢力操控「雷動」的動機是什麼？一是香港管治權。正如美領事館官員所言，要「繼續在香港推動民間、社會力量爭取民主訴求運動」，鼓勵更多市民參與反對派的政治行動，並且積極搶佔立法會議席。隨着政改方案破局，外國勢力能夠爭奪的只剩下立法會，「雷動」開宗明義就是要爭取非建制派議席過半，如果計劃成功，香港政局隨時由行政主導變成立法主導，反對派就可以完全封殺政府施政，香港管治權也將旁落。

二是要在反對派之中進行「洗牌」，借「雷動」棄保，將一些過氣政客、參政多年但毫無成績的反對派更新換代，讓一班更加聽話、對青年更有迷惑性的新一代接班。其實，在選舉前，一班反對派第二梯隊輪流到黎智英大宅「面試」，已說明外國勢力正在「揀卒」。而「雷動」的任務，就是在最後時刻，推動選民將票力保這些新秀。只要將「雷動」的最後棄保名單拿來看，就可以看到「雷動」究竟保的是誰，棄的是誰了。

棄選是反對派的「政治天仙局」

美恩

在9月4日立法會選舉將近舉行之前，有多名反對派候選人突然背棄支持者，聲稱以「大局為重」選擇棄選，並引導市民去投其他「貨源歸邊」的反對派候選人，這明顯是反對派操控選舉的騙局。

猶記得於今年年初，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首次提出其所謂的「雷動計劃」，「教導」市民怎樣因應「民調」去投非建制派候選人一票，目標是爭取非建制派於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取得過半議席。「雷動計劃」的第一部分便是「協調參選」，戴耀廷原先的設計是希望反對派在參選之前先進行初選，讓較具勝算的候選人報名參選，而其第二部分分別是「策略性投票」、「雷霆救兵」，則是引導市民因應「民調」在「危險關頭」作出策略性投票。戴耀廷還不斷地危言聳聽，指若果建制派候選人在直選中得到過半議席，「剪布」便是事在必行，其目的顯而易見，就是為市民「洗腦」，因應「民調」結果，不理候選人政綱，只要投向他們認為信得過的反對派候選人。

「先協調後配票」操控選舉

「雷動計劃」的構思是「先協調，後配

票」，前一部分是反對派參選人參與，後一部分則是選民參與，今次多名反對派候選人突然宣佈退選，明顯是「雷動計劃」的「修訂版本」，反對派棄選而選擇在選舉前才有所動作，目的是殺建制派一個措手不及，連作出部署的時間都沒有。棄選明顯是反對派操控選舉結果的一部分，亦是最後階段，這是徹頭徹尾的騙局。因為今次「港大民研」亦一如以往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所負責，他過往負責的民調(當中包括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往往備受市民質疑，而他更涉嫌配合戴耀廷「製造」出三個令「佔領行動」事在必行的「民調」結果。

至於今次「港大民研」的主要贊助者，則是有強烈政治偏向的「民主動力」，「民主動力」曾與其他香港反對派政黨及團體成立所謂「真普選聯盟」，更發起過91名民選議員及增選委員聯署反對2016年及2017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立場明顯是偏向反對派，香港的兩大電視台亦因此而停止公佈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負責的立法會選舉滾動民調數據。

編造謊言醜化民主選舉

反對派先以戴耀廷之「雷動計劃」瘋狂向市民「洗腦」，配合滿有誤導性和可信性成疑的「港大民研」結果，首先讓市民一步一步入局，然後「協調」多名「民研」結果得分不高的候選人退選，以避免「浪費彈藥」令建制派得益的「大道理」，煽住選民去選擇他們早已內定的反對派參選人。策動「雷動計劃」的是反對派自己人，贊助「港大民研」是反對派自己人，連負責「港大民研」的，亦是反對派自己人，這接近「完美」又無痕跡的配搭策劃，明顯是一個蓄意引領選民墮入的「政治天仙局」。

反對派為求目的，不擇手段，除了不斷編造「證據」抹黑建制派「賄選」之外，更涉嫌促使自由黨候選人「變節」退選製造「白色恐怖」，如今又要求多名反對派候選人「臨陣退縮」，出賣選民，其醜陋與突兀程度，是歷屆選舉之冠。他們醜化了民主選舉，令選舉變成「自出自如」不受約束的「無掩籠籠」，他們進入議會的目的，若不是癱瘓議會運作，拖延議案審議進度，浪費公帑，便是協助「港獨」人士為所欲為，損害香港人的整體利益。反對派對香港毫無建樹，他們不僅是披上羊皮的狼，亦是出賣香港的罪人。

全方位制止「港獨」魔爪進校園

蔡毅 太平紳士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新學年伊始，少數激進分子走到學校門口派發單張，向心智未熟的學生宣揚「港獨」思潮，將魔爪進一步伸向校園、荼毒學生，策動事件的非法組織「學生動源」，更在18間中學成立所謂「本土關注組」。這些行動雖然受到家長和學生的一致抵制，但其惡劣影響不容忽視。「港獨」勢力入侵校園，其目的就是要荼毒心智不成熟的中小學生，在他們幼小的心靈播下分裂國家、撕裂社會、仇視同胞、暴力衝擊法治的種子。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事關「一國兩制」的事業是否後繼有人。「港獨」對學生灌輸分裂國家的思想，無異於顛覆香港的「一國兩制」，不僅禍國禍港，也會毀滅青少年的個人前途。因此，在校園內應當從輿論上、法律上、校規上，全方位地制止「港獨」入侵校園。



蔡毅

政府須盡快提供指引

面對「港獨」思潮入侵校園，政府當局和學校必須快速應對。首先，律政司必須向教育局提供指引，盡快宣佈哪些涉及「港獨」的行為和組織屬非法。並在法律「紅線」的基礎上設定專業「紅線」，對在校園和教學過程中討論「港獨」問題作出清晰的規定，要求有關討論必須在指明「港獨」違法本質的前提下才可進行，令有關討論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從而限制少數人借「討論」在校園內宣揚「港獨」。

其次，學校應該修訂校規，明確制止及處罰在校園內進行「港獨」宣傳和組織活動。「港獨」違法違憲，乃眾所周知的。中小學的教育環境需要受到更多的保護，社會上可以討論的話題，心智未成熟的年幼學子卻不宜討論。校規應比法律更嚴格，就是要為學生營造有利身心健康發展的環境。「港獨」問題不是一個可以在學校討論的問題，正如鼓動暴恐的問題不能在學校討論一樣。

警惕「港獨」混入校園內部

再次，教師是學生的思想引導者與知識傳播者，當局應當制定清晰指引，絕對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播「獨」。教師可以引導學生辨明「港獨」的利弊，但倘若老師在校園內「鼓吹港獨」，則是違背專業精神，教育局對其追究責任亦是合理。

其實，鼓吹在中學校園討論「港獨」是言論自由的人，應該去問一問美國政府會否容許在校園內大講「伊斯蘭國」的暴恐宗旨和教義，也可以去問一問德國政府會否容許在校園內讚揚美化邪惡的納粹。在中學校園鼓吹和推動「港獨」，是存心靠害心智尚未成熟的中學生，絕非言論自由問題。

在校園內反「港獨」必須是全方位的。當局要特別防止「港獨」團體混入了學校的內部，其性質和黑社會滲入學校從事犯罪活動是一樣的，在必要時應採取行動防止「港獨」組織進行滲透學校，有效地保障學生的健康成長。

時尚九月 精彩紛呈

蘇錦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今年9月是香港時裝界充滿盛事的月份，有多項推廣時裝的活動會接連推出。打響頭炮的是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首屆CENTRE STAGE國際時裝商貿展會，將於9月7至10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參展的約200個亞洲區內時尚品牌和時裝設計師，將藉着展會平台向時裝買家，特別是買手店、百貨公司和網上商店、時裝媒體，以及區內時裝愛好者，推介他們的時裝系列。活動以業界為主要對象，是香港貿易發展局嶄新時裝推廣和發佈平台的重要一環。市民亦可於9月10日當天入場參觀，感受時裝界的最新時尚。

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於9月7日同場舉辦另一項大型時裝推廣活動—Fashion Mirage時裝

匯演。活動邀請約50名來自不同年代的香港頂尖時裝設計師，為多個具香港特色的主題，包括香港夜景、飄色及大都會等，精心設計全新時裝，再配以現場的視覺效果，為參觀匯演的嘉賓帶來難忘的時裝旅程。

同日開始的還有香港設計中心在元創方舉辦的Fashion PMQ時裝嘉年華。大家可於9月7至19日期間，到訪元創方內多個工作室，欣賞及購買不同範疇的設計師時裝展出的設計及聯乘產品。此外，元創方於9月9至11日設有時裝市集，讓大家即場選購本地約40個時裝及配飾設計品牌的產品，以及參觀展覽、觀賞表演和參加工作坊，支持本地創作。

我亦向各位推介由元創方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合作的Smart Fashion時裝展覽。大家

可於9月6至21日到元創方，參觀由11個本地時裝設計單位運用智能紡織(smart textile)技術設計的成衣作品。

除上述一系列推廣活動外，政府推動本地時裝業發展的其他項目亦如火如荼地進行，包括暫定明年第一季推出的「時裝創業培育計劃」。該計劃由香港設計中心營運，為時裝設計公司提供一系列度身設計的培育服務。此外，由今年9月至明年3月，政府會與業界合共推行另外五項推廣香港時裝設計師和新進時裝品牌的活動，以及兩項與技術培訓有關的項目。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創意香港」會繼續與業界攜手，推廣香港成為亞洲時尚之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香港的時裝業。

G20杭州峰會扭轉國際貿易頹勢

楊凡欣 中國人民大學重慶金融研究院產業研究部國際合作項目主管

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全球貿易持續低迷，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全球投資資金缺口加大，貿易投資規則碎片化，國際金融市場不穩定，地緣政治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加劇，使得全球經濟增長前景很不明朗，G20增長目標的實現和經濟全球化受到挑戰。全球貿易和投資的持續復甦是經濟復甦的實質。但從2008年G20華盛頓峰會開始，即便反對抬高投資和貿易壁壘的呼聲持續不斷，但是效果式微。

2016年，作為G20領導人第11次峰會的主席國，中國努力推動G20從「危機驅動型」向「全球長期增長機制」的轉化，並在貿易投資機制化方面取得豐碩成果。2016年，為應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趨勢和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下滑，G20貿易部長們於7月9日-10日在中國上海舉行了貿易投資機制化後的首次會議，會議批准了首份《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和《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等「三份文件」；達成加強多邊貿易體制和綜合施策、幫助發展中國家和中小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兩項重要共識。這些成果可以說是G20成立以來在貿易投資方面最為卓著的成績。作為G20杭州峰會的配套活動之一，此次G20貿易部長會議實現了G20貿易投資政策合作機制化，2016年相當於開啟G20貿易投資機制化的元年。

推動全球貿易投資制度發展完善

中國在推動全球貿易和投資機制性建設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在當前投資協定碎片化的背景下，極具里程碑意義，尤其達成的首個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為全球投資領域合作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可以認為，中國舉辦的G20杭州峰會是全球貿易投資體系的新轉折點，將進一步推動全球貿易與投資體系發展和完善。

當前，全球貿易與投資體系面臨不少挑戰。首先，全球投資貿易體系日趨龐大且複雜。根據WTO的資料，截至2013年，已生效的地區或優惠貿易安排超過了350個。根據2015《世界投資報告》顯示，當前世界上生效的雙邊、區域以及多邊投資協定接近3,300項。這些雙、多邊以及區域貿易投資協定構成了龐大而複雜的國際貿易投資體系。但如此之多的協定之間存在着許多重疊、缺陷和衝突，這導致了國際貿易投資爭端也隨之增多且複雜化。

其次，世界貿易組織(WTO)正面臨十多年來最大的挑戰。2015年12月19日，162個WTO成員國的貿易部長匯聚肯尼亞內羅畢，但是卻沒有「重申」回歸多哈回合談判，聚焦多哈回合談判的目標——即在全世界範圍內達成一個統一的貿易協定，這是2001年多哈回合談判啟動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多哈回合談判裹足不前的情況似乎意味着多邊制度爭端解決機制的優點已被忽視。

再次，TPP等可能對全球貿易體系產生衝擊。TPP

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商業核心，其優勢被成員國廣為宣傳。按照目前的情況看，TPP是在WTO框架外進行談判，並只限於一個排他性的名單內的成員參與。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其成員國能夠就協定的所有條款達成共識，而實際上，當其成員國真正執行協定時難免有爭端，為此它們還需要成立一個獨立的爭端解決機制。這個解決爭端的機制則完全可能跟WTO的現存機制相似，而其作用無非只是造成不必要的地緣政治影響，即在其成員國之外一個經濟壁壘。此外，氣候變化等一系列挑戰正在威脅當前的全球貿易與投資體系。

鑒於此，7月10日在中國上海舉行的貿易部長會議，G20貿易投資政策合作機制化在國際貿易投資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G20從最初的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發展到G20領導人峰會，再到2016年新增的G20貿易部長會議，切實地推動G20貿易與投資合作機制建設，有利於推動全球貿易與投資體系的發展和進一步的完善。

突顯中國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的表率作用

G20貿易投資政策合作機制化及貿易部長會議取得的成果將在G20杭州峰會上得到進一步落實。首先，9月3日，G20杭州峰會的重要配套活動20國集團工商峰會(簡稱「B20峰會」)在杭州舉行，這是中國為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所搭建的重要平台，B20將



■面對環球經濟困境，大國之間更需要合作。圖為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G20峰會上會面。

向G20杭州峰會遞交政策建議報告，貿易促進經濟增長仍是報告主要議題。

其次，作為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的主席國，中國非常具有建設性地確保了G20工作的繼承性和連續性，比如杭州峰會提出了「創新、活力、聯動、包容」這四大新議題。創新、包容性增長等非常重要的新議題，突顯出當今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結構改革起到的促進增長的重要表率作用。

此外，杭州峰會上還將在反對貿易保護以及促進全球貿易增長方面進一步形成共識和確立基本原則，並將採納在創新、企業家精神以及電子商務等方面的建議並確保實施。當然最終的落實還有賴於國際多邊機構在貿易投資領域的作用，同時，也需要各個國家根據達成的基本原則去克服國內利益集團的阻礙，調整國內政策。